

至完全否定以前的政治认知和评价。

在本文测量结果中,个人月收入、职称等在高校青年教师政治态度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均与政治态度的习得缺乏一致性有关。进一步通过对年龄、个人收入和职称之间的相关分析还发现,三者之间均互相显著相关,年龄越大职称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小职称越低收入越低。

(二) 社会快速发展使政治态度缺乏稳定性

政治态度受到贯穿于各机构社会化过程中的连续性的影响。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对稳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很高,从童年到成年,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利益集团、传播工具等政治社会化的各种输出机构对一个人施加的影响大体相同,对几代人施加的影响也少有变化,那么一个人甚至几代人的政治态度就会不断得到强化,可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但是这种情况在现代纷繁复杂、急剧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则不太可能出现。

中国有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历史,精英治理、“清官”情结在民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知识分子崇尚的处世准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传统官僚阶层的为官之道。虽然君主和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消失了已经百年,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完成,民众的政治心态仍然处于由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变过程之中。社会变革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引起政治情感、认知和动机的转变。许多青年教师的成长历程是从学校到学校。一方面他们广泛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和政治理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他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强化着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对世界主义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矛盾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认识,致使他们有思想但缺乏深度,有独立意识但缺乏坚定的信仰,有参与变革的愿望但缺乏持之以恒的信念,有创造成就的追求但缺乏人文关怀。

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群体来说,高校青年教师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和认识,也置身于这个变迁过程之中,成长过程深受环境的影响。在政治文化缺乏稳定性和一贯性的情况下,其政治态度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表象,以致于难有规律可循。这也是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态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得分不是很高、表现不是很好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性别、年龄、学位、住房以

及学校层次等变量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态度没有解释力的重要原因。

(三) 信息传播影响政治态度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信息传播方式正对现代人们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工具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影响是能够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使政治信息广为人知,激起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关注和兴趣。“因此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们也曾作过不少努力,试图通过控制大众传播工具来动员人们支持政权,并灌输对国家象征的认同意识。”^[4]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使传统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功能和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怎么样评价新型信息传播工具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改变都不为过分。相关问题已有太多研究和论述,不需在此重复。

结合研究目的,本文认为信息传播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和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政治信息接收渠道,政治信息的交流也更加方便。人们接收政治信息的内容和速度几乎没有差别,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去对政治活动进行判断和评价,这必然使人们的政治态度更加多元化。二是政治事件、政治活动和其他社会事件的不透明容易导致人们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对其中真相的掩盖则更容易导致对政府、权威及其所控制媒体的不信任。

高校青年教师对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手段非常熟悉,也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主要群体。在尚未对新型信息传播工具的影响有足够认识,或者有了足够认识但尚无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顺应这一变化的情况下,高校青年教师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度影响政治态度

社会变革使得我国民众的“单位人”特征在减弱,社会化程度在增加。这一变化有利于民众减少对单位的依赖,增强对社会的共识,但也对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执政党从上到下对权力的垄断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上层和基层之间的隔阂,而合法的正式沟通渠道不甚畅通,新的有效的沟通方式尚未建立,致使社会中纵向和横向的政治沟通不畅。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以及其他的社会中产阶层也同样缺乏合理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并且越是面对更大的政治场域就越是感觉